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传达与读者*

朱 蕾

(南京大学 教育科学与管理系,江苏 南京 211171)

摘 要: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文化传达便是它的一个重要主题。对于文化差异的处理,在文学翻译中一直存在归化和异化两种策略。理想的翻译还要表达原文的言外意义,包括文化效应,而文化效应的终点便是读者。因而,读者在翻译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通过对文学翻译中归化和异化两种策略的分析,指出这两种策略的运用以及文学翻译中的文化传达均应以读者为优先考虑。

关键词:文学翻译;文化传达;读者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7)02-0079-03

在开放发展的全球化国际氛围下,社会科学研究正发生着一系列历史性的变化。在从文学批评到翻译理论,从哲学思考到人类学探索,研究的重心和视角都发生了转移。这种变化在当代文艺理论领域表现尤为突出。体现在素有语言关怀传统的翻译理论领域则表现为“文化热”在翻译界的兴起。在《当代美国翻译理论》一书中,郭建中教授提到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的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交际理论在翻译理论上的体现,二是对文化转换的重视深刻动摇了重视语言转换的传统。换言之,因为交际与文化都具有以人为本的特质,人文关怀在翻译界已经赢得高度的重视,翻译理论界正在加强宏观把握,拓展翻译视野,加强翻译工作的文化融合功能。

中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1]。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鲁迅先生就充分认可了“文化传递”的重要性。然而,基于文化与语言的若干特点,翻译工作所能完成的只是尽可能多的文化传递,“文化传真”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或是说,终极的目标。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2]然而,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如双关的翻译就很难用译语完整地传达原语的意义。在以下句子“If we do not hang together, we would be hanged together.”中,hang一词在英语里既有“挂”又有“吊死”之意。而汉语中,没有等效的多义词。文学作品中这类双关现象尤为常见。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中,第二幕新王问哈姆雷特说:“我的儿子(son),你为什么躲在阴影里(shadow)。哈姆雷特用了一个双关来回答“too much sun”。这里的sun与son同音,是一种含沙射影的讽刺,讽刺哈姆雷特的叔父篡夺王权,又假意亲热。在翻译时,这一棘手的问题,最多只能用注释来告诉读者原文的巧妙又完整的含义表达,原语的睿智用心则在直接译文中出现空缺。再如《苔丝》中,克莱尔抱苔丝、莱蒂、玛丽安、伊兹过河一节中,克莱尔说:“Three Leahs to get one Rachel”一句中,没有文化背景的读者就无法理解该句的含义。所以,译者不得不在此采用

* 收稿日期:2006-03-07

作者简介:朱 蕾(1970-),女,江苏如皋人,南京晓庄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南京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系硕士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加注的手法。不胜枚举的此类例子说明这种语言与语言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翻译时完全的等值等效是难以做到的。本文将主要从接受理论的角度分析翻译中的文化传达。要解决该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分析和归纳一下这种文化隔阂的产生原因。

奈达把语言文化的特征分为五类:Ecology(生态学)、Material Culture(物质文化)、Social Culture(社会文化)Religious(宗教文化)Linguistic Culture(语言文化)^[3]这显然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所以,造成中西文化差异的两个主要的因素也分别来自精神方面的思维的差异,与迥然的物质因素影响。

西方思维自苏格拉底开创思辩的方式起,惯于逻辑思维、抽象思维;中国则偏重形象思维(此点在中西方文字形式的差别上可见一斑),加之迥然的历史及宗教传统、哲学思想、语言文化,使得对于原文的理解难度加大。对与较抽象的思维影响来说,物质因素对翻译欣赏的影响更加琐碎,更加具体。诸如地理环境,传统习俗的物质化反映等几乎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翻译界有名的东西风之争就是一例。东风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是和煦温暖的,代表着春天和美好事物。李商隐《无题》诗云:“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东风是该是催开百花的使者,所以才有百花残而怨东风之感慨。有英译法为:

Hard it was to see each other ——

harder still to part!

The east wind has no force,

the hundred flowers wither. (INNES HERD-

AN)

It's difficult for us to meet and hard to part;

The east wind is too weak to revive flowers dead. (许渊冲)

这种译法在西方人眼中无疑失去了那种淡淡幽怨之韵。因为缘于英国的地理位置,东风在英国人的眼中是凛冽的刺骨寒风,而西风温煦和暖。这样的直译扭曲了中文的文化意境。

对于具有文化内涵的地方,翻译中一般有两种出路:即:归化策略(domesticating method)和以美国翻译论家 Lawrence Venuti 为代表的异化策略(foreignizing method)。归化是采用民族中心主义态度是外语文本符合译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语文化。在强势文化中较多采用这种

方法。比如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翻译理论中注重强调译者的创造。他最有影响的译作《中国》不能严格的当作翻译作品来看待,因为译文中没能充分的传达中国的文化。译文中归化的现象很多,有的恰到好处,有的却有弄巧成拙之嫌。鉴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必要的语序上的归化是很必要的。比如:History on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就要作必要的归化而译为“美国现代文学史”;同样将中国俗语“情人眼中出西施”译成英文时就要调整语序以符合西语习俗,译成“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与归化相比,在中国当代翻译中异化的手法更加常见。异化是指对文化价值观的偏离主义的压力下,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境。例如上句中,“西施”这一文化内涵丰富的词(cultural item)就被异化了。再如,英语中很多植物,尤其是花都具有特定的含义如:金盏花虽然美丽却象征痛苦与悲哀。茉莉花在中国象征纯洁,入梦则没有特别的指意,而在英国却象征一段浪漫的恋爱将至。在这种情况下贸然的归化将彻底遗失特有的文化内涵。所以只好采用注释的办法以指示(而非传达)“洋味”。

谈到我国的翻译史,异化与归化的例子都不鲜见。著名的傅东华的《飘》的译本采用的就是归化的手法,傅先生为了使文学作品深入大众,把作品中的主人公加上了中国传统的姓,译成了“郝思嘉”“白瑞德”……并解释说归化手法的“目的是忠实于全书趣味精神,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飘》序)。张友松、张振先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译本中,(第十七章)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I bet you can't spell my name,” says I.

“I bet you, what you dare I can,” says he.

“All right,” says I, “go ahead.”

“George Jaxon—then now,” says he.

最后一句被译为“荞麦的荞,自治的自,清洁的清,克服的克,孙子的孙——怎么样,”他说。这种翻译在当今自然不太可取,但也提供了归化翻译的典型例子。以色列的特拉维拉派的 Evan-Zohar 的多元系统假说认为强势文化的多元系统内,译者往往采用归化;弱势多元系统内,译者多用异化或阻抗式翻译策略^[3]。在象英美这样的强势文化系统内,归化翻译是一种强劲流派,而在当今中国大规模的归化却并不可取,容易造

成读者的心理误解。异化的实例不胜枚举,如外国的人名地名,文化内涵词语等。

具体的翻译实践走过的是这样一条道路:从文本(含有原文化内涵)——译者——译者构造的文本(含被译者理解的文化内涵)——译者传达的文本(包括译者能够传达的文化内涵)——读者的接受(包括读者所能理解的内涵),也就是说翻译的终点是停泊在读者身上的,而文化翻译更是针对读者的。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一书中指出“译文实际是原文+原文文化背景+译文+译文文化背景+原作者的气质和风格+译者的气质和风格的混合体。”^[4]

而翻译得成败只能由读者来校验。也就是说读者是所有以上因素的综合衡量者。翻译的首要任务是要让译文读者看得懂,理想的翻译还要表达原文的言外意义,其中就包括文化效应。所以,文化效应的终点也是读者。由此可见,读者在翻译中的地位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文化传达更应该以读者为第一优先考虑。

奈达将翻译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分析、转换、重组、与检验^[2]。在检验的阶段无疑读者才具有最大的发言和评判的权力。校验的标准就是奈达著名的“动态对等”和后来的“功能对等”。翻译是力争朝着“最高层次的对等”的靠近,而“最低

层次的对等”则是基本要求。这些对等都受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限制。当代读者反映论和接受理论都强调读者对译文的参与作用。在功能对等翻译中,译文受者是一个重要因素,是交际活动的参与者(在翻译道路的最后一环,也是决定性的一环)。当读者理解一篇译文时,他们因受姚斯的“期待视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的制约会不可避免的对应他们母语的用法或他们的本民族文化习惯的知识。所以,与其说译文的读者能否正确理解译者所要传达的意思关键不在于语言而在于文化。所以,对文化差异的处理,即是归化还是异化就成了理解译文的文化内涵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认为归化和异化都各有道理,各有各的用武之地,不能绝对的摒弃任何一方。总的说来,归化大都表现在语言的层面上,是为了跨越语言理解的障碍。而在文化传达上,为了让读者充分理解西方文化,译者大都采用异化策略。在文化传达问题上的异化恰恰是为了最终使得读者在文学作品的欣赏中做到真正的归化,也就是说,使读者把原语经译者所传达的异域视野经过自身的文化视野过滤、对比、沉淀而后引起视野的重新定位,在对比中做到对自身文化和原语文化的再认识,即:在文化意义上的完成真正的归化。

参考文献:

- [1] 孙致礼. 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M]. 北京:译林出版社,1999:59.
- [2] 谭载喜. 新编奈达论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 [3] 王东风. 翻译学的文化地位与读者的文化态度[J]. 中国翻译,2000(2):17-19.
- [4] 刘宓庆. 文化翻译论纲[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5.

Reader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Strategies

ZHU Le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and Administr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1171, China)

Abstract: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change of language, i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wo cultures. Cultural conveying, therefore, is the important subject for translation. As for the handling of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re are two translation strategies——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The optimal translation should reflect what is actually meant in the original work, thus exerting the cultural effect on readers. Therefore, the position of readers in translation allows of no negligence. By analyzing the two strategies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point out that both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wo strategies and the cultural conveying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readers.

Keywords: literary translation; cultural conveying; readers